

新时期“多元一体”语言政策 的变化与发展

——基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规划的文本研究*

赵蓉晖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摘要]新中国的语言政策兼顾“一体”与“多元”。1992年以来发布的5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规划纲要,是了解我国官方语言政策及其发展最直接、可靠的依据。本文对这些规划纲要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新时期的语言政策保持总体稳定,但在对语言本质、语言文字的社会价值、语言多样性、语言文字工作内容的认识和实施方面均有变化,对语言多样性的包容不断增强。本文还根据对历史亲历者的访谈和历史背景考察,揭示影响我国官方语言政策的多方面因素。

[关键词]中国语言政策;多元一体;显性语言政策;新时期语言政策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397(2016)01-0002-08

DOI:10.16499/j.cnki.1003-5397.2016.01.001

nity in Diversity: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of Language Policies in Modern China——A Textual Analysis of National Language Planning Documents

ZHAO Ronghui

Abstract: China's language policy takes both unity and diversity into consideration. The 5 five-year plans of national language planning and a national strategic blueprint for medium and long-term languag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ublished by the State Language

[收稿日期] 2015-09-08

[作者简介] 赵蓉晖,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国家语委科研基地“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语言学史。

* 本文受到以下项目的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化城市的外语规划:上海与纽约、东京的对比”(13BY057),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3-0905),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母语的地位作用与和谐语言政策的构建”(ZDA125-10),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国际语言政策综合资源库建设”(ZDJ125-1),201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世界语言政策综合资源库建设与比较研究”特此致谢!

Commission since 1992 are direct and reliable evidences for China's language policies. Analyses of these documents reveal that China's language policies remain generally consistent but changes occur in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nature, the social values, the diversities of languages and the contents of language planning tasks. It is also found that language policies in China are more inclusive about language diversities. Moreover, this paper discusses factors behind China's language policies by interviews of 5 key stakeholders and by explanations of releva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Keywords: China's language policy; unity in diversity; explicit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olicies in modern China

语言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法律清楚地表明了国家官方语言政策的基本原则。分别于1954、1975、1978、1982年颁布的不同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强调民族平等的基本国策,赋予各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1982年版中增加了一条新的内容“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①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充分保障少数民族语言在民族自治地方使用的同时,还有鼓励各民族干部相互学习语言文字、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要求。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也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如上所述,1982年之前的语言政策主要强调尊重民族语言平等,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又增加了推广普通话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尊重各民族及其语言”是我国语言政策的基本前提,“推广普通话”是我国官方语言政策的一条主线。对此,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主体多样”的语言政策(周庆生,2013)。由于费孝通(1989、1999)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认识和解决我国多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影响深远,因此我们将中国的语言政策相应地总结为“多元一体”的语言政策。本文将探讨“多元一体”的语言政策在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尤其关注“一体”部分的变化,并揭示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

一 关于新时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规划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语委”)的前身是国务院下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曾是一个研制语言文字改革方案的学术性机构,1985年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增加了贯彻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的行政职能(苏培成,2010;陈章太,2014;魏丹,2015)^②。目前,国家语委明确的工作职责是“拟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编制语言文字工作中长期规划;制定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并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指导推广普通话工作。”^③由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特别是民族语文教育和翻译出版工作)始终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民委”)主管^④,国家语委的工作基本上围绕汉语和汉字开展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在1984年10月举办的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1986年1月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推广普通话被确立为新时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苏培成,2010),后来又成为国家语委基本的工作职责之一。因此可以说,新时期国家语委的工作核心是制定国家总体语言政策,制定和推行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主要承担

“多元一体”的语言政策格局中维护“一体”的职责。

自1986年起,国家语委开始制定阶段性工作规划,这些规划的时间跨度少则5年,多则10年,成为各阶段指导全国语言文字工作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至今已正式颁布了5个规划纲要^⑤:1.《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1992年10月20日颁布,以下简称“八五规划”);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计划》(1996年7月15日颁布,以下简称“九五规划”);3.《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五”规划》(2001年7月27日颁布,以下简称“十五规划”);4.《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一五”规划》(2007年4月30日颁布,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5.《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2012年12月4日颁布,以下简称“中长期规划”)。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规划属于典型的政府公文,其制定过程和写作都遵循严格的程序和规范,几经讨论审核(魏丹,2015)。作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主管单位,国家语委的工作规划不仅要体现当时的决策者对语言文字工作形势的总体判断和目标,同时还要配合这些目标制定工作任务,提出保障措施。尽管不同年代发布的规划在结构布局上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其内容都可归结为三个基本部分:(1)指导思想,包括对语言文字的基本认识、对以往工作的总结、制定新规划的基本原则;(2)目标和任务,提出下一阶段需要完成的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3)工作措施,明确围绕目标的实现需要采取的措施、步骤。因此,历年颁布的工作规划既能体现语言文字工作的基本理念,也包含了用于实施政策的可操作性内容,还因其时间上的连续性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们是了解我国官方语言政策及其发展、实施途径最直接、可靠的依据。本文的分析针对“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这两个部分展开。

二 新时期语言政策的变化与发展

进入新时期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对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工作思路。当时就已经认识到,“今后的语言文字工作将与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建立更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它所应参与和管理的领域已经大大超过以往文字改革所具有的内涵”(苏培成,2010:460)。随着机构名称的变更,国家语委对语言文字工作的多层面思考与探索在其制定的历次工作规划中都得到了体现,而不同时期的内容表述则反映了我国核心语言政策的变化与发展。

(一) 对语言文字基本认识的变化与发展

国家语委工作规划的开篇部分首先阐述对语言和语言文字工作的基本认识,体现了语言决策者的基本语言观,是我国官方语言意识形态的直接表达。语言意识形态是一套有关语言的本质及运用的共享看法、信念、态度(Errington,2001;Kroskrity,2004;Rumsey,1990),是语言政策的核心理念和政策制定的出发点。

从国家语委工作规划的文字表述看,我国官方对语言本质属性的认识有所发展。《八五规划》指出“语言文字是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九五规划》提出“语言文字是信息的主要载体,是协调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交际工具。”《十五规划》的表述是“语言文字是交际的工具和信息的载体。”《十一五规划》没有直接阐述语言的本质,首次提出“需要将语言作为一种国家资源加以保护和利用”。《中长期规划》的阐释最为丰富完整“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是促进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

要力量。”可以看到,我国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信息载体和交际工具是语言最基本的属性,作为国家资源的性质被提出之后,语言作为文化要素、文化标记、社会要素的特征最终获得明确。这种认识上的发展变化会直接影响语言政策的其他层面。

(二) 对语言文字工作社会价值的认识与发展

语言文字工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古今中外都是国家建设、民族发展的重要内容。新中国建立之初,语言文字工作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一大批语言文字学家投身于语言调查、民族识别、文字改革,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时期后,语言文字工作的重心转移,文字改革逐渐淡化,推广普通话成为新时期的首要任务(苏培成,2010:457)。在不同时期颁布的国家语委工作规划中,都有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社会价值的阐述,从中可以看到语言决策者对自身工作的定位和认识,也能看到语言文字工作与当时的国家大战略的对接与融合。

历次规划都提到语言文字工作与社会各行业密切相关,强调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称其具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价值。《八五规划》中的表述反映了这种基本的认识:“语言文字工作是关系到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一项基础事业,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社会各行各业息息相关。做好语言文字工作对我国文化、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和加强国际交流都有重要作用。”此后的几次规划中都重现了这一基本认识,同时又有所发展。

《九五规划》中强调了语言文字工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及产业的特殊价值,同时明确“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是公民意识、国家意识和现代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规划》提出语言文字工作应为西部大开发战略服务,“在西部地区依法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为进一步加强东、西部交流,改善投资环境,促进西部经济和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语言文字环境”^⑦。《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了语言和谐问题^⑧,指出语言文字工作要“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服务”,并认为“需要消除城乡和区域间语言隔阂,在农村、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全民语言文字的应用和信息化水平”。《中长期规划》首次用“语言文字事业”的表述代替了过去的“语言文字工作”,把语言文字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语言文字事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特点,是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历史文化遗产和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都对语言文字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可见,从1992年的《八五规划》到2012年的《中长期规划》,中国语言政策的决策者们对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围绕着一个核心,经历了显著的历史变化。一方面,对语言文字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并使之服务于提高社会交际效率和信息化建设,始终是语言政策“一体”部分的核心目标;另一方面,官方语言政策的社会目标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当时的国家大战略紧密配合。与此同时,语言文字的社会价值被不断提升,影响范围也逐渐扩大,在《中长期规划》中已被明确地提高到国家战略、文化软实力的高度。

(三) 对语言多样性的认识与发展

1984年10月召开的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提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语言文字工作应当

把普通话的推广放在首位”(苏培成,2010:457)。1986年制定“七五”工作规划时再次明确:“推广普通话,这是新时期语文工作的首要任务。……到本世纪末按普及普通话的三级要求,实现或基本实现普通话成为教学语言、工作语言、宣传语言以及公共场合的交际语言,这个目标已经定下来了,应当努力去实现。”(陈章太,1986)

国家语委历次工作规划在谈到未来的工作目标和基本任务时,都十分强调这一工作重点。《八五规划》和《九五规划》表明“推广普通话是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十五规划》中,“大力推广、积极普及普通话”是十五期间主要工作任务的第一条。《十一五规划》中要求“坚持主体化方向,积极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长期规划》也明确将“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今后一个阶段的指导思想,并将此作为主要任务的第一条。可见,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我国官方语言政策的主体与核心,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是直接为这一目标服务的手段。

在维护语言主体性的同时,新时期的语言政策也发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变化,官方语言政策中对语言多样性的认识与包容都有了显著的改变。《八五规划》《九五规划》和《十五规划》都只强调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指简化汉字)的主体地位,《十五规划》还提出“迫切需要培养大批民汉兼通的双语人才”,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需求。《十一五规划》第一次提出要“正确认识语言生活的多样性,依法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妥善处理方言及繁体字使用问题,处理好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问题,关注虚拟空间语言生活的状况,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需要将语言作为一种国家资源加以保护和利用,支持濒危语言的保存抢救和弱势方言保护工作,探索将语言文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的有效途径”。《中长期规划》对语言多样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它在“指导思想”部分把“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并列提出,并要求“尊重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树立各民族语言文字都是国家宝贵文化资源的观念,有针对性地采取符合实际的保护措施,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科学规划各种语言文字的定位和功能……”

国家语委作为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最高机构,其工作核心始终没有改变。但在保证“多元一体”语言政策的核心(也就是维护语言主体化方向)的同时,决策者对语言多样性的认可与包容在“十一五”开始时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繁体字、濒危语言和弱势方言、手语和盲文、外国语言文字等过去被忽视的内容都进入了官方核心语言政策的范围,而且作为语言资源的有机成分要求加以承认和保护。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告诉我们,语言是一个“异质有序”的系统(祝畹瑾,2013),变异不仅是语言存在的自然状态,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承认语言内部的差异,不仅是对语言客观事实的认可与尊重,也符合当代语言规划所强调的“语言生态观”“语言资源观”和“语言权利观”。

从另一个角度看,“多元一体”语言政策中“多元”的部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上位法中已经有所规定,而且,民族语文事务历来由国家民委负责管理,国家语委主要负责普通话推广和语言规范标准的研制(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语委工作规划中出现语言多样性的观点和措施就更加引人注目。

(四) 语言文字工作内容的丰富与发展

为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规划提出的目标,历次工作规划都明确提出了特定阶段的工作

任务,从中可以看出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内容的发展与变化。

1986年制定“七五规划”时曾明确“大力推广普通话,推行汉字规范化、标准化,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三件事是我们要做的主要工作。”(曹先擢,1986)从1992年起公布的5个规划文本看,国家语委的工作任务已经超出了“七五”时的认识。推广普通话、规范汉字、管理社会用字、制定语言标准、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进语言文字信息化这六项内容在历次规划中都作为工作任务提出,它们是国家语委的核心工作内容,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与此同时,国家语委的工作内容还随着历史的发展有所变化。

《九五规划》首次提出“建立语言文字法规体系,实现语言文字工作的依法管理”和“搞好宣传教育活动,加强科研工作、信息工作和对外交流”这两个新任务。《十五规划》首次提出“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十一五规划》中,新出现的任务是“完善现行汉字和普通话语音的基本标准体系(这里指普通话评测认证系统、汉语应用能力的立体测试系统)”。《中长期规划》中,国家语委的工作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在以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制定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标准、外国语言文字使用规范”和“提高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弘扬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等新内容。可见,随着对语言本质与社会功能认识的不断发展,语言文字工作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已经从比较单一的语言标准化拓展至语言信息化、语言保护、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提升、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传承等领域,工作的对象也不再限于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还增加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盲文、手语、外国语言文字等。

三 原因分析

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变化体现在多个方面,反映了我国主体语言政策的丰富和发展。为了解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笔者访问了国家语委工作规划制定过程中的一些亲历者,并通过查阅史料补充了相关背景知识。结果发现,导致我国核心语言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语委工作范围的扩大和社会语言生活的实际变化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陈章太(2015)、李宇明(2015)等都提到,由于国家的对外开放、信息化建设、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群的迁徙、互联网影响力提升等原因,语言生活的形态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很多需要语言文字管理者回答和解决的新问题,“人大、政协和行业部门都会向我们反映语言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媒体、网络、学者和各级语委机构也会提出有关语言的现实问题”。(李宇明,2015;魏丹,2015)这是促使语言政策发生变化的客观条件。

第二,语言文字工作需要积极适应国家发展的大战略。魏丹(2015)在回顾国家语委工作规划的制定过程时提到,每一次规划的写作班子都必须认真学习国家政策,务求使语言文字工作能够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配合重大战略的施行。我们在历次规划的文本中都能发现一些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表述,例如《九五规划》中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⑥,《十五规划》中提到的“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西部大开发”^⑦,《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和谐语言生活”^⑧,《中长期规划》中提出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等,都是对当时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的呼应和对接。姚喜双(2015)特别提到,《中长期规划》中要求的“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其直接依据就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的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直接写进了第二年颁布的语委工作规划中。

第三,来自学术科研的影响。陈章太(2015)、李宇明(2015)和魏丹(2015)都提到,与其他领域的工作相比,国家语委的工作始终带有很强的专业性,学术色彩浓厚。一方面,国家语委的前身是由语言文字专家组成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有很强的学术传统,先后担任国家语委副主任的许嘉璐、陈章太、傅永和、李宇明、姚喜双等本身就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专家,始终活跃在科研一线,他们即使卸任,也会在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中继续发挥作用,“这是国家语委特有的‘旋转门’制度”(魏丹,2015)。另一方面,国家语委有由语言文字专家组成的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和联系密切的专业研究机构(如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近年来与高等院校、专业研究机构合作建立了18个研究中心),也保证了语言决策者与学术界的联系。“学术研究中的最新成果能够及时被国家语委了解……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也能得到及时的关注。”(李宇明,2015)语言文字各类规范标准的研制和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都会通过国家语委的各类项目平台组织专家参与。因此,学术界的研究也会对语言文字工作产生直接的影响。

由此可见,语言生活的变化、国家战略的调整、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与新动向都对国家语言政策产生了影响。来自中央层面的大政方针,来自基层的现实需求与学术思潮,在国家语委的平台上相遇,共同促成了国家官方语言政策的变化与发展。

四 总结

根据 Weinstein(1979、1983)、Schiffman(1996)、Wiley(1996、2000)等人的观点,语言政策应包括两种类型:(1)官方/显性的语言政策,指以政府法令及条例等形式明文规定的语言政策;(2)隐性/模糊的语言政策,指包括语言态度、观念等在内的和语言相关的意识形态,也可称之为“语言文化”。中国学者李宇明(2007:13)则认为,语言政策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本文所探讨的是我国的官方/显性/成文的语言政策。

对国家语委5个工作规划的文本分析表明,新时期的官方语言政策保持了总体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但又有所发展。语言决策者对语言文字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变得更加深刻,使语言文字工作的内容因此得以丰富和拓展。尽管国家语委的工作核心是维护“多元一体”语言政策中的“一体”部分,但它对语言多样性的认可与包容在不断增强,使得“一体”语言政策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因素。

对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进行探究后可以发现,我国官方语言政策的制定会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官方/显性/成文的政策和隐性/模糊/不成文的政策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对话”,最终促成了中国语言政策的历史变化。

[附注]

- ① 本文引用的法律条文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www.gov.cn),以下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 ② 参见1985年12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通知》;1988年12月10日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审议并批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三定”方案》。
- ③ 摘自中国语言文字网(www.china-language.gov.cn)。
- ④ 参见国家民委网站(www.seac.gov.cn)。
- ⑤ 《八五规划》《九五规划》《十五规划》文本均来自《新时期语言文字法规政策文件汇编》(2005),《十一五规划》《中长期规划》文本均来自教育部官方网站(www.moe.edu.cn),以下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 ⑥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中央1994年8月23日颁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把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当作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部分。

- ⑦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
- ⑧ 党的十六大(2002年)和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年)、四中全会(2004年),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 [1] 曹先擢. 关于《“七五”期间语言文字工作规划(草案)》的说明[Z]. 教育部档案室. 1986.
- [2] 陈章太. 在“七五”期间语言文字工作规划会议的总结讲话[Z]. 教育部档案室. 1986.
- [3] 陈章太. 论语言资源[J]. 语言文字应用 2008,(1).
- [4] 陈章太. 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
- [5] 陈章太. 本文作者对原国家语委副主任陈章太先生进行的专题访谈记录[Z]. 2015-9-5.
- [6]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 [7]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 [8]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 新时期语言文字法规政策文件汇编[Z]. 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5.
- [9] 李宇明. 明了各国国情 顺利传播汉语[J]. 世界汉语教学 2007,(3).
- [10] 李宇明. 论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建设[J]. 中国语文 2010,(4).
- [11] 李宇明. 本文作者对原国家语委副主任李宇明教授进行的专题访谈记录[Z]. 2015-8-20.
- [12] 苏培成. 当代中国的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 [13] 王铁琨. 基于语言资源理念的语言规划——以“语言资源监测研究”和“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为例[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6).
- [14] 魏丹. 本文作者对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原政策法规处处长魏丹老师进行的专题访谈记录[Z]. 2015-8-20.
- [15] 徐大明. 语言资源管理规划及语言资源议题[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
- [16] 许嘉璐. 开拓语言文字工作新局面,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服务——国家语委主任许嘉璐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Z]. 教育部档案室. 1997.
- [17] 姚喜双. 本文作者对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姚喜双教授进行的专题访谈记录[Z]. 2015-8-21.
- [18] 周庆生. 中国“主题多样”语言政策的发展[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
- [19] 祝畹瑾. 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20] Errington, Joseph. Ideology [A]. In *Key Terms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ed. Alessandro Duranti, pp. 110-2. Malden, MA: Blackwell. 2001.
- [21] Kroskrity, Paul V. Language Ideologies [A]. In *Compan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ed. Alessandro Duranti, pp. 496-517. Malde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2004.
- [22] Rumsey, Alan. Wording, Meaning, and Linguistic Ideology [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2: 346-61. 1990.
- [23] Schiffman, Harold F. *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24] Weinstein, Brian. Language Strategists: Redefining Political Frontiers on the Basis of Linguistic Choices [J]. In *World Politics*. 1979 (20): 344-364.
- [25] Weinstein, Brian. *The Civic Tongu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Language Choices* [M]. New York: Longman. 1983.
- [26] Wiley, Terrence G. & Marguerite Lukes. English-only and Standard English Ideolog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In *TESOL Quarterly*. 1996 (3): 511-530.
- [27] Wiley, Terrence G.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Ideolog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In *Ideology, Politics and Language Policies: Focus on English*.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0.